

陈绍宽俭朴奉公写人生

林海



海军名将陈绍宽

民革前辈陈绍宽投身海军建设40年，执掌民国海军17年，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他不愿打内战，辞职明志；解放战争后期，他走向光明，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启了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的爱国新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陈绍宽先后担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立身刚正、清廉自砺，为中华民族的俭朴奉公这一传统美德，留下了生动感人的历史注脚。

俭以养德品自高

陈绍宽在任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时，一日三餐同普通职员一样吃伙房供应，从不挑肥拣瘦，每顿饭只上3碗菜。抗日战争期间，海军总司令部设在重庆一幢简陋平房，身为海军总司令，每天早餐也只是两个地瓜配一个鸡蛋。

抗战胜利后，陈绍宽辞官归隐故里。饮食仍保持俭约清淡，早餐常以煮黄豆为肴，家人认为长期食黄豆腻口，改买花生，他认为浪费而制止。

新中国成立后，陈绍宽担任福建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依旧俭朴如故。三餐经常是一荤一素或再加一碗汤，并且从不上馆子，也不吃夜宵。每逢端午、中秋、春节这三个传统节日，都要请身边的警卫、服务人员会餐，事前交代炊事员给些大家爱吃的，同时反复叮嘱不要大吃大喝。

陈绍宽平日穿着整齐洁净，他穿的贴身内衣和袜子其实都布满了补丁。他的生活用品总是跟随他很久，利用得“彻彻底底”。一次，勤务兵替他缝补内衣，禁不住问：“部长你为什么不要一件新衣服穿？我们海军没人穿这么破的衣服。”陈绍宽却安慰他：“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我们不要忘本。”抗战时他担任海军总司令，当时好几年未发军装，他和许多官兵一样，一直都穿着很陈旧的军装。他有一套正式场合才穿的派力司中山装，一直穿了十多年。他的一只手表用了几十年，因太古旧平时不戴在手上，而是放在上衣口袋。别人劝他买只新的，他拒绝了，说：“手表是用来对时间的，不是戴给人家看的。”

1945年底，陈绍宽归隐回乡那天，身着灰色棉袄棉裤、黑色布鞋，携带许多箱行李。村里人帮他挑运行李时，以为解官归里肯定满载财物。一人故意把箱子滑落使箱盖微开，箱里露出的尽是些书籍和旧衣服等生活用品。

他曾因公务顺便回乡，发现乡里文盲多，小学校舍不全，慨然将军功赏银5万银圆的半数捐出，独资捐建了庐雷小学，学生的学费和书籍文具费也均由陈绍宽每月另付。从此，庐雷村教育振兴，人才辈出。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少年时代便是在这里入学的。此外，陈绍宽还经常接济家乡生活困难的乡亲。

在福州陈绍宽故居里，有一张引人注目的床榻。它仿制成军舰床榻的式样和大小，长184厘米，宽73厘米，高40厘米。床榻古朴简洁，狭窄仅够翻身。这张日夜相伴的床榻凝聚着他无限的海军梦，表明陈绍宽即使退役后也没有安享大床软卧，始终难以割舍对海军的依恋。这张小床还有一个重要喻示：陈绍宽忠贞不渝的爱情。他20岁成

俞平伯的君子之风

王厚明

20世纪30年代，俞平伯被中国大学聘为国学系教授，随后不久他邀请知名作家、民盟成员毕树棠到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课程。毕树棠与俞平伯为近邻，经常晤谈、互倾积愆，也由此成为莫逆之交。因清华南迁，毕树

棠一大家人口众多只能留守清华保管会。尽管生活极其艰难，可毕树棠坚持不任伪职，全家十几口人靠其教书代课、翻译作品维持生计。期间毕父和胞弟先后病故，可谓雪上加霜。俞平伯为了帮助毕树棠，请毕树棠给他的孩子当家庭教师，每月50元。毕树棠曾说：“那时没有这么高的价，的确是雪中送炭。”这些小事，俞平伯既顾及朱自清、毕树棠的面子，又暗地无私相助，从中可一窥俞平伯的君子风范。

1937年北平沦陷后，物价飞涨，俞家因滞留北平生活日渐艰难，坚决不与日伪合作的生活俞隆云一度靠卖字为生。因为是前清探花，登门求学的人络绎不绝，一时

婚，4年后妻子病逝，其后便终身不续娶。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特将妻子灵柩移葬故居山前，以朝夕远望哀思。

陈绍宽的俭朴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临终前，他将侄儿、侄女叫到病床前，交代了四个“不”：在他走后“不要哭、不戴孝、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一切从俭。

奉公无私众人仰

1921年陈绍宽任“通济”号舰长时，家里房屋被白蚁蛀坏，父亲听说儿子军舰停泊马尾，赶到舰上管儿子要钱建房。陈绍宽把当月200元薪饷都给了父亲。父亲失望之余，临走时带走一条军用毛毯。陈绍宽发现后，即派侍卫连夜赶到庐雷村，取回公家的毛毯。老父亲从此再不到舰上来了。

1929年，陈绍宽父亲去世，他返乡奔丧。马尾港海军司令部接南京总部发来电报后，赶派小汽船迎接，海军陆战队也派一个连到庐雷担任保卫工作。然而陈绍宽却从乌龙江峡南岸，雇一船户代挑行李。他不着戎装，只穿长衫布鞋，步行回家。后来他每次因军务返回，公余必回乡祭拜父亲，也总是不带侍从独自返乡。

陈绍宽担任福建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时，请客应酬总是自己

掏腰包。他常说：“公私一定要分明，不允许假公济私”“花公家的钱要精打细算，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多花，该花的，也得尽量节约”。1960年6月，他随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印尼，公家发给他3丈布票购买衬衣（当时每人一年只有1丈4尺布票），他没有用完，把剩余的全部退还全国人大，他说：“这是公家发给我出国时买衣服的布票，不能挪作他用”。

1960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拨款修缮陈绍宽故居。陈绍宽后来经常谈起这件事时说：“这座房子几乎被白蚁蛀空了，如果没有修理，恐怕保存不了多久。政府为修理这座房子，花了这么多钱，我实在过意不去。”他对侄儿说：“若不是政府修缮，这老厝早塌了，现在人还在，名义上是我的，实际上是政府的，所以你们不要再到那里住了。”

陈绍宽在海军基层担任过多艘舰艇的舰长，从不自己吃空饷和贪占财物。从晚清到民国的旧海军制度，舰长有两笔收入属于陋规：第一笔是吃空饷。海军士兵，有时出缺半月或一月，所余薪饷归舰长。陈绍宽的船上也因循旧例吃空饷，但他从不饱其私囊，而是用作士兵福利。还有一笔是船上五金料具包干，消耗品的补充和购买虽然零碎但数额很大。这笔款由舰长全权掌握，很少有从中捞取油水的。陈绍宽每年拨款备料，都按部件消耗程度精细核实、合理分配经费。

1930年，陈绍宽担任海军部部长，月薪800银圆，他每月只花120元左右用于生活开支，余款全部寄存海军部作建设经费。另有部长公费五六百元，也全部用作造船修舰。

一身正气耀故里

陈绍宽为政从不荐私亲。亲属找他介绍工作，他总是说，海军是有专门技术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有一年内侄从福州跑来南京海军部谋职，他直接拒绝。内侄责其“绝情”，转而提出借钱安家，但陈绍宽只给路费。内侄走后，他寄了一笔钱给内侄安家。这表明陈绍宽不为亲徇私，但对亲友的冷暖十分关心，济亲而不为亲破规。他在担任福建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时，凡办公时间亲属来访概不接见，但都请秘书到传达室去接谈。

1945年陈绍宽离职归隐、脱离海军时，这位月薪16000元法币的前海军总司令，竟仅余12000元法币的积蓄和几箱相伴终生的书报。

1993年3月3日，根据亲属要求，陈绍宽骨灰从福州文林山迁移到家乡庐雷村安葬，村民全都赶来送葬。有人问村民，“这样隆重地举行陈绍宽骨灰安葬仪式，是他的官大吗？”一位村民随口应答：“世上当大官的多了着呢，我们村里出了个陈绍宽，因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们感到光荣而自豪。”

（作者系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教授）

难以应付，只好由荣宝斋代售，有时供不应求，就由俞平伯代笔。

北平沦陷后，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而俞平伯和周作人素有师生之道。俞平伯因有年迈老人需要照顾，不能远离。此后，日寇多次要求俞平伯与他们合作，均遭拒绝。若不是周作人从中周旋，他很有进班房的可能。尽管周作人一再请俞平伯接替他到燕京大学国文系讲授“现代散文”，俞平伯回信婉辞，与周作人保持了距离。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俞平伯不失人伦之德，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请他“薄其罪责，使就炳烛之余光，遂其未竟之著译”；此后又与沈兼士等15位教授给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写信，希望对他宽大处理，让其能著述。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俞平伯的谦谦君子之风，缘于他“周急”于人的善良，也出自他“喻于义”的涵养，更有他“坦荡荡”的胸怀，如同他新诗《春水》中映照其人格：“日光照河水，清且明”。

蔡元培创建“进德会”

周惠斌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私德不修，祸及社会”，蔡元培非常重视教职员工的品行修养及道德建设，为整饬校风，砥砺德行，1918年初，他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

所谓“进德”，意指通过锤炼个人的道德行为，树立新的社会风尚，潜移默化、影响他人，达到提升全民道德修养及其水准的目的。1月1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9号上刊登《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提出组织进德会的目的，在于增进个人道德品质，甘当清流之士，担负起改良社会风气的职责。

“旨趣书”明确了进德会甲、乙、丙三个等级的会员条件。其中规定：“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在“旨趣书”中，蔡元培还概括提炼了加入进德会的三大社会功效：一是可以绳己，二是可以谢人，三是可以止谤。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鲁迅写信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对于不同的信，鲁迅在信尾所用的问候语是不同的。

1925年7月16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鲁迅就北京女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封建家长式的统治和许广平讨论，语言诙谐幽默，信尾用的问候语是“顺颂颂祉”，意思是，祝你在吵嚷中得到幸福，表现了他的乐观精神。

鲁迅早期写信的时候，多用文言文，结尾常用“此颂曼福”“即颂时绥”等句子。后来，鲁迅用白话文写信，如果收信人从事的是著译工作，鲁迅在信尾写的是“即颂著祺”“即请撰安”等词。如果收信人是教师，鲁迅在信尾用的是“并请教安”。如果收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1952年，柳青为了体验生活，把全家从北京迁往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他把一座破庙稍作修整，一家人一住就是14年。

柳青体验生活，涉及方方面面。他先是改换衣着，剃了光头，穿着对襟黑袄，戴一顶瓜皮帽，俨然一副当地农民的打扮。白天，他挽着袖口和裤腿，与村民一道下地耕锄；晚上，叨着农民的旱烟锅，与农民一起开会聊天。闲暇时，坐在田间地头与村民们唠家常。刮风下雨，农民发愁，他也发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高兴，他也高兴。

柳青喜欢赶集。每逢王曲镇集日，他都提着竹篮，戴着草帽，跟一块去赶集。到了南街供销社门前，排队时他喜欢听人无拘无束地说“闲话儿”。排到他时又借故不买，又跑到后面排队。每次赶集他都要用去大半天，用意不是排队买东西，而是为了熟悉生活，体会排队队的滋味、观察群众的心理活动和倾听排队人群的议论。

为了熟悉集市上的粮食交易情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20世纪80年代初，高晓声小说创作进入黄金时期，所以请他去各地讲座的邀请函也纷至沓来。尽管他写作繁忙，但还是——满足各地读者的要求。不过，由于高晓声的普通话讲得很不理想，他的讲座一般都使用方言，也因此留下了许多趣闻。

有一次，他在家乡常州的化工学院进行《和青年朋友谈写作》的讲座。一个能容纳1200人的大会场竟然座无虚席，甚至连台阶上、过道里都坐满了人，高晓声也正讲得劲头十足，热血沸腾，满头大汗。

突然，后排站起一位学生，大声说道：“高老师，您讲的方言我们听不懂，请您说普通话。”高晓声愣了一下，随即巧妙回答道：“对不起，农民作家习惯说家乡话。你要是听不懂，就请周边听得懂同学给你‘翻译’一下！”高晓声这番话说完，引

鲁迅写在信尾的问候语

王吴军

信人是学生，鲁迅在信尾用的是“即颂学安”。如果收信人是夫妇，鲁迅在信尾用的是“即请偕安”。如果收信人离家在外，鲁迅在信尾用的是“即请旅安”。如果信是写给母亲的，鲁迅在信尾用的是“恭请金安”。如果是在春节时写的信，鲁迅在信尾用的是“即颂年禧”。如果是在春夏季节写的信，鲁迅在信尾用的是“并颂春祺”“顺请暑安”。此外，鲁迅还根据不同的信而在信尾写“日安”“时安”“刻安”等问候语。

1935年7月，作家叶紫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经饿了”“借我十元或十五元钱，以便救急”。7月30日，鲁迅给叶紫写了一封回信，给了他一些钱，信尾用的问候语是“即颂饿安”，热心助人之余，也显示出了他的风趣幽默。

柳青取材有道

王剑

柳青为了体验生活，把全家从北京迁往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他把一座破庙稍作修整，一家人一住就是14年。

柳青体验生活，涉及方方面面。他先是改换衣着，剃了光头，穿着对襟黑袄，戴一顶瓜皮帽，俨然一副当地农民的打扮。白天，他挽着袖口和裤腿，与村民一道下地耕锄；晚上，叨着农民的旱烟锅，与农民一起开会聊天。闲暇时，坐在田间地头与村民们唠家常。刮风下雨，农民发愁，他也发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高兴，他也高兴。

柳青喜欢赶集。每逢王曲镇集日，他都提着竹篮，戴着草帽，跟一块去赶集。到了南街供销社门前，排队时他喜欢听人无拘无束地说“闲话儿”。排到他时又借故不买，又跑到后面排队。每次赶集他都要用去大半天，用意不是排队买东西，而是为了熟悉生活，体会排队队的滋味、观察群众的心理活动和倾听排队人群的议论。

为了熟悉集市上的粮食交易情

高晓声说方言

周星

起了台下学生的一大笑。

后来，高晓声又受邀去广西桂林和柳州进行文学讲座。当时整个会场庄严肃穆，听众都很认真地听他讲座，现场气氛与在家乡讲座的感觉截然不同。讲座结束后，高晓声很惊讶地说道：“哎呀，我这一口常州方言，这些听众他们究竟能够听懂多少呢？我想想自己脸皮再厚，也还是感到有些难为情的，我真佩服他们的耐心和礼貌啊！”

组织方的工作人员笑着说：“高老师您谦虚了，我们这些听众都很喜欢您和您的作品，所以他们都想来现场一睹您的风采！”

高晓声一听，又乐起来了，自嘲地说：“哈哈，现在我这一口常州方言大概是有点名气了，因为它能使人深刻印象，深刻就深刻在一般人很难懂！”

就这样，高晓声始终带着他的常州方言到全国各地进行文学讲座。